

孙宝山 著

命题来梳理和阐释中国哲学

指导下，本书突出了中国哲学作为修养学和知行合一学的特点。西方古代哲学是以本体论为中

西方哲学的本体大学本科通识教材国哲学研究的时候也重点突出了道体，实际上中国古代各学派在谈论道体时主要是为身心修养

的根据。尽管修养的方法口是心非，但人上都是修养论为中心，而修养论在西方是不算哲学的，这是中西哲学的一个显著

中国哲学的本质就修养论而言，西方哲学主要是一个知识形态，可以为了求知的目的和出于思辨的兴趣而

的探讨，而中国哲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形态，它必须将所知道的道理切实落到行动上其意义才能彰显出来，只单纯地作理论的探讨而不将

是没有意义的，ZHONGGUO ZHIXUESHI XUANJIANG 个点，同之处，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修养学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知行合一学，本书也着

国哲学的这另一特点，尽量让学生在学中国哲学时不要单纯地把它看作是一种理论知识，不妨选择最切合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一下，不但要

行，这样收获才会更大。

中国哲学史选讲

ZHONGGUO ZHIXUESHI XUANJIANG



个点

同之处，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修养学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知行合一学，本书也着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学本科通识教材

中国哲学史选讲

孙宝山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选讲/孙宝山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81119-730-3

I. 中… II. 孙… III. 哲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6668 号

ZHONGGUO ZHEXUESHI XUANJIANG

中国哲学史选讲

孙宝山 著

责任编辑 张宏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6 千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自 1919 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已有多部有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问世，前辈学者在此方面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也在不断地更新，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当大家回顾和反思中国哲学一百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探索下一步的走向时，产生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它使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中西哲学所存在的差异和以往在使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哲学时所产生的诸多局限，运用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新的理论框架去对中国哲学史重新加以诠释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正是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笔者决定撰写《中国哲学史选讲》，尝试用新的理论框架去对中国哲学重新加以梳理和诠释。

本书共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概述》，对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的产生及现状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最后从中归纳出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第二部分是《中国哲学的形成》，对中国哲学的初期观念，先秦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名家思想等中国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三部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两汉经学、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经学大潮中的异类王充，魏晋玄学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四部分是《中国哲学的成熟》，对理学的兴起、发展、成熟、分化和周敦颐、二程、张载、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五部分是《中国哲学的转换》，对明末清初思想的变化和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中国传统的哲学到戴震就基本结束了，清末以来在西方影响下的思想形态应属于近现代哲学的范围。

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大学教材普遍存在繁难的特点，对于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而言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对于教师而言在有限的课时之内又难以讲授完毕，只能有选择地进行讲解。有鉴于此，本书以简明为基本原则，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突出，在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形成、

发展、成熟、转换的脉络进行总体梳理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哲学学说、哲学流派进行了重点阐释，以使學生既能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总体把握，又能对重要的哲学思想有较深的了解。

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大多采用“以西论中”的方法来梳理和阐释中国哲学，本书采用“以中论中”的方法即主要运用中国传统既有的术语、宗旨、命题来梳理和阐释中国哲学。在这一方法的总体指导下，本书突出了中国哲学作为修养学和知行合一学的特点。西方古代哲学是以本体论为中心，为了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相呼应，许多学者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时候也重点突出了道体，实际上中国古代各学派在谈论道体时主要是为身心修养提供更加坚定的根据，尽管修养的方法和最终的指向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修养论为中心，而修养论在西方是不算哲学的，这是中西哲学的一个显著差异，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本质就是修养学，本书着力突出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西方哲学主要是一个知识形态，可以为了求知的目的和出于思辨的兴趣而单纯作理论的探讨，而中国哲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形态，它必须将所知道的道理切实落到行动上其意义才能彰显出来，只单纯地作理论的探讨而不将其落到实处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知行合一，这是中西哲学的又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修养学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知行合一学，本书也着力突出了中国哲学的这另一特点，尽量让学生在學習中国哲学时不要单纯地把它看作是一种理论知识，不妨选择最切合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一下，不但要知，而且要行，这样收获才会更大。

本书以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和非中国哲学史专业学生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对于他们了解掌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知识、并进而运用于自身的生活实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孙宝山

2009年4月19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关于哲学的起源	(1)
一、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	(1)
二、“哲学”一词的提出	(2)
三、苏格拉底三师徒的哲学观	(2)
四、哲学的三特性	(3)
第二节 关于中国哲学	(4)
一、“哲学”一词的引入	(4)
二、中国哲学学科的设置	(5)
三、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	(11)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形成	(13)
第一节 初期观念	(13)
一、天	(13)
二、命	(14)
三、革命	(14)
四、德	(15)
五、民意	(16)
六、鬼神	(17)
第二节 先秦儒家思想	(17)
一、孔子的生平与学说	(18)
二、孟子的生平与学说	(25)
三、荀子的生平与学说	(39)
四、《中庸》的作者与学说	(48)
五、《大学》的作者与学说	(53)

六、《易传》的作者与学说	(58)
第三节 先秦道家思想	(67)
一、老子的生平与学说	(68)
二、庄子的生平与学说	(79)
第四节 先秦墨家思想	(90)
一、墨子及其学派	(90)
二、墨子的学说	(93)
第五节 先秦法家思想	(98)
一、韩非的生平	(98)
二、韩非的学说	(99)
第六节 先秦名家思想	(104)
一、白马非马论	(105)
二、离坚白论	(106)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发展	(108)
第一节 董仲舒的生平与学说	(108)
一、董仲舒的生平	(109)
二、董仲舒的学说	(109)
第二节 王充的生平与学说	(118)
一、元气生成论	(119)
二、天道自然论	(119)
三、命定论	(121)
第三节 玄学的兴起	(123)
第四节 贵无论与崇有论	(125)
一、王弼的贵无论	(125)
二、裴頠的崇有论	(129)
第五节 独化论	(131)
一、自生	(132)
二、无待	(133)
三、自然	(133)
四、玄冥	(134)
五、相因	(134)

六、适性	(134)
七、无为	(135)
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成熟	(137)
第一节 理学的开启	(137)
一、韩愈的生平与学说	(137)
二、李翱的生平与学说	(143)
第二节 理学的成立	(146)
一、周敦颐的生平与学说	(147)
二、二程的生平与学说	(149)
三、张载的生平与学说	(154)
第三节 理学的成熟	(158)
一、朱子的生平	(158)
二、朱子的学说	(159)
第四节 心学的形成	(167)
一、陆象山的生平与学说	(167)
二、王阳明的生平与学说	(171)
第五章 中国哲学的转换	(180)
第一节 明末清初思想概述	(180)
一、“经世学风”的兴起	(180)
二、理学思想的变化	(181)
三、反理学思想的形成	(185)
第二节 王夫之的生平与学说	(188)
一、王夫之的生平	(188)
二、王夫之的学说	(189)
第三节 黄宗羲的生平与学说	(197)
一、黄宗羲的生平	(197)
二、黄宗羲的学说	(198)
主要参考文献	(211)
后 记	(213)

第一章 概述

本章从哲学的起源讲起，对中国哲学的来源、形成、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基本特点加以简单的概括，使大家对于中国哲学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为下面进入专题讲述做好准备。

第一节 关于哲学的起源

一、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是从创世神话和原始宗教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泰利斯(Thales，鼎盛年约前 585 年)在西方被公认为是第一位哲学家，他首次提出了“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一问题，并给出了答案水是万物的本原，即水本原论，以后又出现了气本原论、火本原论等。

关于泰利斯存在着两则逸闻：一是泰利斯因仰头观看星象而跌落井里，侍女嘲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忽视了一边身边的一切；二是泰利斯以哲学见称而贫困得难以自给，世人都讥笑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一年冬天，他通过观测天象预知来年气候条件好、橄榄将获丰收，于是事先租赁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等到夏天橄榄丰收时再以高价出租，赚了一大笔钱。从这两则逸闻看出哲学的基本方向：

(1)哲学以不变的本质为研究对象

哲学不是以变幻不定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

是寻求各种变幻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本质。

(2) 哲学是非功利性的思辨活动

哲学是非功利性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它的目的不在于致富，尽管哲学家完全可以凭借智力和知识发财，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二、“哲学”一词的提出

泰利斯被看作是第一位哲学家，这只是后人的一种追认，当时并无“哲学”一词。一般认为，比他稍后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年约前 532 年)最早使用了“哲学”一词，并且是自称哲学家的第一人。毕达哥拉斯所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其本意是“爱智慧”(philosophia)的意思。据说，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同弗琉斯的统治者雷翁谈话，雷翁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并询问他的技艺是什么？他说自己不是什么技艺大师，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哲学家。雷翁又问哲学家是什么？他举例说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奥林匹克的人有的是来参赛夺冠的，有的是来做买卖赚钱的，还有的是来做观察者的，在生活中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而只有少数人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把自己的时间用来思考自然和人生问题，静静地审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做爱智慧的人，这些人就是哲学家。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并没有把哲学等同于智慧，哲学是热爱智慧、探求智慧的学问，哲学家是热爱智慧、探求智慧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

三、苏格拉底三师徒的哲学观

泰利斯和毕达哥拉斯对于哲学的理解对后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徒都产生了影响。

苏格拉底(Socrates，前 469～前 399 年)自称是没有智慧、但热爱智慧的人，他承认自己无知，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传出神谕说他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他就到处去验证。他去拜访一位有着极高声望的政治家，结果发现此人只是自认为自己聪明，但并非真的聪明，他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认为自己知道，而苏格拉底却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又去访问诗人，结果发现诗人写诗靠的不是智慧，而是某种天才或灵

感，这就好像占卜家和先知发布各种启示，但却不知道到底启示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些诗人认为自己对其他所有的行当都有完善的理解，而实际上他们是无知的。他又去找那些工匠，他发现在他们的专业能力的范围内，他们的确比他聪明，但他们依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声称对其他行当都有完善的理解，犯了与诗人同样的错误。经过这一系列探访，他最后得出结论：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最聪明的人是像他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苏格拉底对自身的定位显然受到了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观的影响，在他看来，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哲学家并不拥有智慧，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断地探求智慧、接近智慧。苏格拉底在进行这些考察探访时对别人自认为所拥有的智慧予以了驳斥，指出了他们的无知，结果使他四面树敌，引来了许多恶意的诽谤，说他是在炫耀智慧，这也是他后来被判处死刑的原因之一。

苏格拉底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是个贤人或智者（诡辩家），但在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前 427～前 347 年）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与智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他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对哲学家的理解：“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那些专心致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我们是不是必须称他们为爱智者而不称他们为爱意见者呢？”（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五卷 475B、475E、480）他对于哲学家的理解与毕达哥拉斯也是一致的。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 384 年～前 322 年）对古希腊自泰利斯以来的哲学观作了经典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一门以求知而非实用为目的的自由的学问（苗力田译《形而上学》第一卷 982b）。“求知”也就是追求智慧，“不以实用为目的”也就是非功利性，由于哲学不以实用为目的，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是为了自身而存在，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哲学上述特点，所以他说：“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同上 983a）

四、哲学的三特性

泰利斯和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哲学的先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徒将其推向鼎盛。从他们对于哲学的理解可以看出，哲学

自其产生起就具有三个基本的特性：

(一) 寻求本质

哲学不是以变幻不定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是寻求各种变幻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本质。

(二) 热爱智慧

哲学是热爱智慧、探求智慧的学问，但哲学并不等同于智慧。

(三) 非功利性

哲学是非功利性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不以实用为目的。

以后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基本上保持了上述特点，后来的哲学家也沿着古希腊先哲所开创的传统来发展哲学。

第二节 关于中国哲学

一、“哲学”一词的引入

中国古来有义理之学、道学、理学、心学等名称，但并无“哲学”这一名称。明朝末年，有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与中国的士人翻译西方的书籍时曾将“费禄苏非亚”一词译为“理学”(艾儒略《西学凡》)、“格物穷理之学”(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这是用中国固有的名称来理解“philosophy”。后来又出现了“爱知学”(傅泛际、李之藻合译《名理探》)的译法，“知”即“智”，“爱知”即“爱智”，将“斐录琐费亚”译为“爱知学”是符合其原义的。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但他们带来的书籍、仪器、技艺的确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后来，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在传教士各派之间发生了“礼仪之争”，即是否允许中国教徒保持祭祖敬孔等礼仪风俗，最后上升到罗马教皇与清朝皇帝之间的对抗，结果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敬孔，康熙帝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中西的交流因此而中断，翻译西方书籍、引进西方术语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

日本在室町时代(1392~1573年)末期也曾与西方发生过接触和交流，但后来由于德川幕府(1603~1868年)实行“锁国”政策，这种接触和交流也停滞了下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引进西学，由于汉字的造词能力很强，日本学者用汉字创造了许多新的语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

“哲学”一词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年)在1874年首次将英语的“philosophy”一词公开译为“哲学”。在此之前，他曾意译为“西洋之性理之学”(《致松冈鳞次郎》)，因为在他看来，西洋的斐卤苏比和东土的儒学性质是一样的，所以采用东土固有的名称来翻译。当然，他对西方的“philosophy”的本义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也曾直译为“希哲学”(《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跋》)，希也就是仰慕，哲也就是智，“希哲学”也就是仰慕智慧的学问，这和传教士、明末士人合译的“爱知学”意思是一致的。后来，他虽然仍认为西洋的斐卤苏比和东土的儒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开门题》)，但他还是认识到了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为了将它们加以区分、避免相互混淆，他最终决定译为“哲学”(《百一新论》)，这个译法以后逐渐得到了日本学界的承认并确立了下来。

“哲学”一词在日本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后又被引进到中国，并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一般认为，清末“维新变法”派人士黄遵宪在1895年前后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日本国志·学术志》)，他在介绍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时提到了“哲学”学科。此后，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的折子中介绍德、英大学的学科时也提到了“哲学”学科(《请开学校折》)。“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和进行中西思想比较研究的文章，屡屡使用“哲学”这一词语。他在日本期间还曾参加过日本哲学会的一次会议，向日本哲学家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哲学的情况(1899年6月《清议报》第23期)。由于梁启超在舆论界拥有巨大影响力，使得“哲学”一词得到广泛的流传、迅速得以普及，很快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一直沿用了下来。

二、中国哲学学科的设置

(一)日本的情况

日本学界最早使用了“哲学”这一译法，同时他们又最早运用哲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加以梳理，从而在大学设立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1. 二战前创立时期

东京大学(1877年设立)于1881年在“和汉学科”中设立了“印度·支那哲学讲座”，由大儒岛田重礼主讲。1882年，改为“东洋哲学史讲座”，由井上哲次郎主讲。东洋主要指中国、印度等，与西洋相对，打出“东洋哲学”的牌子，有与西洋哲学相抗衡的意味。1904年，开设了“支那哲学讲座”。东京大学的学者与政府走得比较近，他们在战前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性研究，而是具有为政府政策服务的目的，所以对儒家学说作了许多歪曲的发挥，如为了对抗欧化政策中所产生的过激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宣扬忠孝一致、爱国、君臣大义名分，将孔子和孟子以后的儒教加以区分，认为儒教的精髓是孔子教，孔子教自古在日本就得到了保存、普及，否定易姓革命，以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等。

其他大学的政治色彩没那么强，大多是作一些学术性研究。京都大学(1897年设立)于1909年开设了“支那哲学史讲座”，由狩野直喜主讲，其讲义后来由他的学生整理于1953年出版，书名是《中国哲学史》。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走的是纯学术路子，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为政策服务的危险倾向持批判态度。他们一方面受到了欧洲的近代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清代的考证学风，崇尚实证，重视对文献的精密解读，主张采用文、史、哲相关联的综合性方法、深入到中国思想的内部去研究。此外，还有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学者也运用欧洲的哲学、社会学等方法对中国的思想进行了学术性研究，并仿照西方哲学史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专著，力图建立起与西洋哲学相比肩的中国哲学乃至东洋哲学的理论体系。

2. “二战”后过渡时期

“二战”后，日本学者都放弃了为政府政策服务的目的，完全从纯学术的角度对中国思想进行研究。他们虽然仍在使用哲学这个术语，但认为从哲学这一视角把握中国思想的实际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为寻找有效的替代性研究框架进行了种种尝试，如岛田虔次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发展路径，沟口雄三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和展开》中提出了“前近代”理论，认为中国在与西方发生接触之前并不是停滞的，也是在不断向前演进的，存在着独自の“近代”或“前近代”这一历史阶段，宋明理学不再是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时期所产生的腐朽没落的思想，而是在

“近代”或“前近代”这一历史背景下而展开的鲜活的思想。东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大多冠以“中国思想”，也是为了摆脱哲学视角的局限。

3. 最新变化

1994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在日本文部省的推动下进行了学制改革，将“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随着这一名称的变化，研究范围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像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科技史、基督教传教史、礼仪、民俗、音乐、绘画甚至饮食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而且和中国相关联的日本、韩国思想也可以进行研究。京都大学虽然仍保留了中国哲学的名称，但早就不具有哲学的意义了，像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思想、科技史、礼仪制度、艺术思想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的，学生的论文除了现当代个别领袖之外没有特别的限制。总的说来，日本的中国哲学学科已经彻底突破了从欧洲引入的哲学框架的限制，走向了文化学的广阔领域。

（二）中国的情况

中国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立要晚于日本，中国学界在运用哲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进行研究方面也比日本学界起步要晚，但是这一过程同样也充满了诸多变换，而且这种变换至今尚没有完成。

1. 设立初期

北京大学于1914年设立了文科哲学门，当时亦称“中国哲学门”，主要教授中国哲学史，由近代知名人士、经史专家陈黻宸主讲。由于主讲者的西学素养有限，使得这一课程笼罩在浓厚的经学气氛中。冯友兰在1915年至1917年期间在哲学门就学时曾听过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课，后来他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三松堂自序》）从陈黻宸现存的《中国哲学史》讲义部分遗稿来看也的确如此，从伏羲到姜太公八万多字，而周公、孔子还未出现，这种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拖沓冗长的讲法已经很难唤起当时学生的兴趣了。

2. 确立时期

（1）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胡适担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1891～1962年）具有中国传统学问的功底，又熟悉西方的哲学理论，不到一年就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

史》和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一般都公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但实际上近代著名学者、活动家谢无量（1884～1964年）早在此前数年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并由中华书局在1916年出版，一时也广为阅读。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在体例上较为完整，将中国哲学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对从先秦到明清的主要哲学派别都作了分析论述，在哲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也确有进展，但总体而言还显得比较简单粗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来以后，把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完全盖过去了，以后谢书就基本被人遗忘了。

胡适对哲学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这是对哲学所作的一个宽泛的理解，目的是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也纳入哲学的范畴。他在对先秦诸子进行精密考证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按照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来梳理先秦诸子的学说，令当时的学界感到耳目一新。此外，此书以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山，将三皇五帝都拿掉了，给人一种单刀直入、简洁明了的感觉，避免了以往拖沓冗长的弊病。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来之后大受欢迎，两个月内出版社就要求再版，一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其风头甚至超过了当时学界最有名望的章太炎和梁启超，很多人都希望他继续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加以研究，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竟成了绝响，后半部一直也没有出来，有上没下，以致成了一些人的笑柄。其中的原因，据说是碰到了佛学的难题，他为此还专门研究了禅宗，撰写了不少文章，被后人汇编为《中国佛学史》。笔者认为，胡适未能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半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学术方法方面，他受清朝朴学的影响太深，太喜欢考证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有三分之一多的篇幅是考证史实，以致劳思光说：“这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哲学’的成分，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新编中国哲学史序言》）后来他研究禅宗又陷入到文献的考证中不能自拔，反而将研究禅宗是为了弄通佛学、进而

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半部这一初始目的冲淡了。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先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版本，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乡里先贤戴震的《水经注》校本不是剽窃之作（《胡适学术文集总序》），可以说对文献考证的过分兴趣冲淡了他对哲学思想的关注。

其次，在学术领域方面，他的学术兴趣太广，不够深入。他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胡适文存三集》卷二《找书的快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兴趣遍及哲学、思想史、文学史、小说史、佛教思想史、禅宗史等诸多方面，兴趣过于广泛，以至于都不够深入，所以就留下了半截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如此，还有一部《白话文学史》也是如此。

最后，在个人性情方面，他太喜欢交游、热闹，不甘寂寞。他喜欢喝酒、交朋友，在京城里名气又大，大家谁都想与他交友，“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时成了可供炫耀的口头语，同他有交往成了文人必备的资历之一（张中行《胡博士》）。他也愿意结交，来者不拒，此外还热衷四处为人证婚。过度的社会交往浪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对他的著述无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他能适当地减少应酬、安心著述，那么凭着他的才智，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半部应该不是一件太难之事。

（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1895～1990年）在1915年至1918年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胡适1917年回国在北大执教讲授中国哲学，二人从年龄上说虽然只相差四岁，但从辈分上说胡适算是冯友兰的老师。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与胡适一样也是师从杜威。1923年，他毕业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1929年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3年6月又完成了下卷，1934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两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孔子为开端。他把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在孔子与老子谁先谁后的问题上，与胡适产生了争执，并由此而结怨，当然，这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因素可能是“瑜亮情结”。

第二，突出了哲学性。他不像胡适那样用许多的篇幅来进行史料的